

# 陈瓘与《四明尊尧集》

## ——北宋哲徽之际党争的一个侧面考察

张其凡, 金 强

(暨南大学 古籍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徽宗年间, 陈瓘曾极力弹劾新党大臣章惇、曾布、蔡卞、蔡京等人, 因而受到了新党的打击, 被贬谪各地, 流移不定, 亲朋好友也受到了牵连。在贬谪地, 陈瓘两撰《尊尧集》, 指斥王安石《日录》, 成为攻击新学和新党的一个旗手。陈瓘在徽宗朝的诸多行为, 如指责曾布“建中调和”、《四明尊尧集》中对王安石的人身攻击等, 恶化了当时的政治空气。北宋后期的党争, 从政见分歧向意气之争和人身攻击转化, 陈瓘等元祐党人实难辞其咎。南渡以后, 随着元祐学术地位逐渐上升, 陈瓘及其《四明尊尧集》日显隆宠, 颇受推崇。

[关键词] 北宋; 陈瓘; 四明尊尧集; 党争; 元祐党人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4)03-0111-09

陈瓘, 北宋徽宗年间著名言官, 当时执政的新党大臣如章惇、蔡京、蔡卞及曾布, 无不遭其弹劾, 结果以言入党籍, 卒穷以死。陈瓘在哲宗、徽宗朝的遭遇是元祐党人际遇的一个缩影, 并且反映了新、旧党争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变质。迄今为止, 通过陈瓘来透视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成果, 尚付阙如。本文拟以陈瓘及其所著《四明尊尧集》为个案进行考察, 庶几也可作为对北宋后期党争研究的侧面补正。不当之处, 尚希识者教我。

### 一、陈瓘的家世及其生平

陈瓘, 字莹中, 号了翁, 又号了斋, 谥忠肃, 南剑州沙县(今福建沙县)人。现据瓘之裔孙陈孔瑛原刻、陈象瀚补修之《宋忠肃陈了斋四明尊尧集》卷首(四库存目丛书本)所附之陈瓘世系, 并经增补和修正, 制成陈瓘世系图(见图1), 俾便参考。

陈瓘的家族自其祖父世卿始显。陈世卿, 字光远, 号豸山, 生于后周太祖广顺三年癸丑(953), 值宋太宗雍熙二年乙酉(985)梁颢榜中进士第二甲第19名, 官至知广州, 大中祥符九年丙辰(1016)卒, 累赠吏部尚书[1](pp. 642-644)。这就为其后代的仕进奠定了政治基础。陈瓘之父偁即于仁宗明道元年壬申(1032)蒙恩补太庙斋郎, 后官至知泉州。到了陈瓘这一代, 则郁郁大盛: 伯兄琼, 治平二年乙巳(1065)特奏名进士, 仲兄瑛, 熙宁六年癸丑(1073)进士, 早卒; 弟, 元符三年庚辰(1100)进士, 历知建、吉二州, 而陈瓘登元丰二年己未(1079)时彦榜进士, 中甲科第三名[2](pp. 16-20)。

[收稿日期] 2003-10-30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作者简介] 1. 张其凡(1949-), 男, 重庆人, 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宋代历史文化研究; 2. 金强(1975-), 男, 湖北郧县人, 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陈瓘踏上仕途之后,长年出任地方州学教授和幕职官,后历迁越州、明州通判。绍圣元年(1094)章惇入相,陈瓘经章惇之荐除太学博士,曾劝惇以“消朋党,持中道”[3] p.10961。陈瓘任太学博士时,薛昂、林自官学省,为报复司马光,议毁《资治通鉴》版,陈瓘因策士题引神宗所制序文以问,两人才罢手[4] p.12。如此说来,在保存《资治通鉴》这部彪炳千古的史学巨著方面,陈瓘之功甚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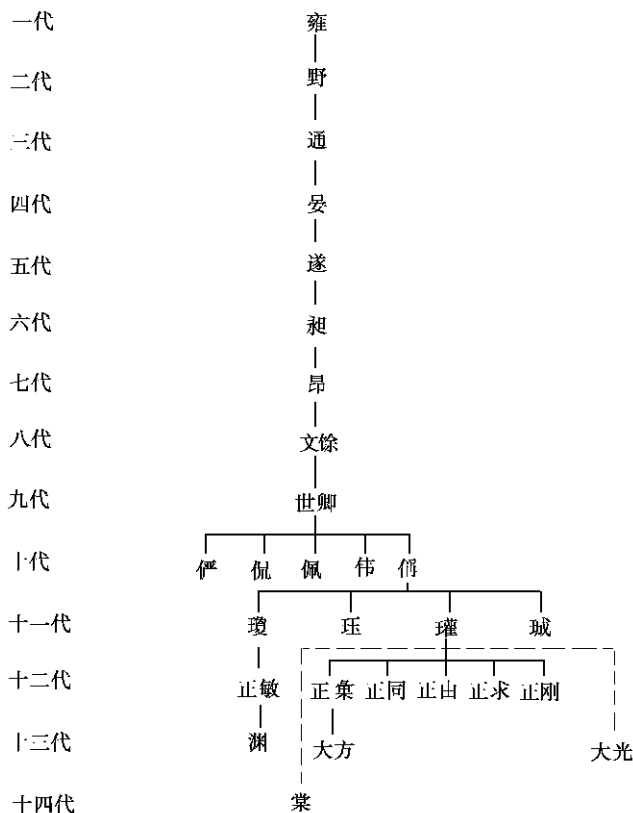


图1 陈瓘世系图

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召陈瓘为左正言。陈瓘刚一上任,即对哲宗亲政后的绍述新法之举进行清算,他说:“绍圣大臣假托经义,用士大夫进取之学,支离虚诞,欺惑先帝,其罪与晋之王衍无异。”[5] p.1311。先帝有日新之意,未几改命,而弃天下于数月之间。爱君之人,念此伤痛,光续前绪,正在今日。岂有事事不改,而可以谓之善继,天下皆非而可以执为国是乎? [6] p.1310。认为徽宗不当拘于前朝之事,应罢绍圣之政。陈瓘自元符三年三月为左正言,九月甲戌(十一日)自左正言迁右司谏,庚辰(十七日)即由右司谏谪监扬州粮料院。在其任言官的六个月时间里,上疏论事不知凡几。笔者在《宋朝诸臣奏议》、《历代名臣奏议》、《宋文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和《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等文献里辑出此间陈瓘所上奏议41篇,可见陈瓘尽到了一名言官的职责。

建中靖国年(1101),徽宗欲调和两党,用韩忠彦、曾布为相,参用新、旧党人。陈瓘虽遭谪监扬州粮料院,但未上任即改知无为军(今安徽无为)。是年三月,改为著作佐郎、实录院检讨官。七月,迁右司员外郎兼权给事中。八月,又因上书指责宰相曾布而出知泰州(今江苏泰州)。此后,编管袁州(今江西宜春),徙廉州(今广西合浦),移郴州(今湖南郴州),移明州(今浙江宁波),复安置通州(今江苏南通),又送台州(今浙江临海)羈管,移江州(今江西九江),移南康军(今属江西),直至移楚州(今江苏淮安)卒,“坐谪至六七不变,卒穷以死”[7] p.10。

## 二、《四明尊尧集》的撰写及相关问题

《四明尊尧集》是陈瓘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此书亦与陈瓘的命运有着重大关联。陈瓘著《四明尊尧集》,其旨在于“与介甫《目录》字字对垒,使天下后世知神考之圣明,介甫之诬谤”〔8〕〔p.5〕。其实,早在建中靖国年(1101)陈瓘就曾撰《目录辩》,他认为:“王安石《目录》七十余卷,具载熙宁中奏对议论之语,此乃人臣私录之书,非朝廷之典也。自绍圣再修神考实录,史官请以此书降付史院。凡目录、政记、神宗御集之所不载者,往往专据此书,追议刑赏,夺宗庙之美以归臣下。”因此,陈瓘致书给《神宗实录》的修撰者之一、时相曾布,批评他“尊私史而压宗庙”,又上书要求“诏史官别行删修《神宗实录》,以成一代不刊之典”〔9〕〔p.3〕。为此,陈瓘由右司员外郎出知泰州。

崇宁年间,陈瓘编管廉州,曾著《合浦尊尧集》;“考诋诬讪玩之言,见蔡卞偏增之意”。据陈瓘自己所言:“当是之时,臣于《目录》考之未熟,知其为增史而已,未知其为悖史也。”〔10〕〔p.3〕因此,当他在崇宁五年(1106)至大观三年(1109)之间寓居明州时,又撰《四明尊尧集》;“谓绍圣史官专据王安石《目录》改修《神宗史》,变乱是非,不可传信,深明诬妄,以正君臣之义”〔3〕〔p.10963〕。

《四明尊尧集》成书以后,在当时和后世的影响都非常大。政和元年(1111)正月,时张商英为相,乃建请下明州取陈瓘《尊尧集》送编修政典局,五月,再下通州取陈瓘《尊尧集》送编修政典局。但是好景不常,随着张商英的罢相,陈瓘的厄运又一次开始。九月辛巳(二十一日)诏曰:“陈瓘自撰《尊尧集》,语言无绪,并系诋诬,合行毁弃。送于张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停,送台州羁管。令本州当职官常切觉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书省。”〔9〕〔p.8〕陈瓘卒后,他的人和著作并没有随之泯灭。靖康元年(1126)二月,宋政府追赠陈瓘为右谏议大夫。绍兴七年(1137),赵鼎相党“党元祐”,陈瓘再次受到褒扬。五月,太常寺言:“近览所著《尊尧集录》,无非明君臣之大分,深有足嘉。瓘宜特令赐谥号以旌表之。”〔11〕〔p.1615〕绍兴二十六年(1156)八月,高宗特下诏赐陈瓘谥号为忠肃,诏曰:“陈瓘所著《尊尧集》,指定王安石《目录》之过,深明君臣之分,殊可叹嘉,可特赐谥……谥曰忠肃,虑国忘家曰忠,刚德克成曰肃。”〔12〕〔p.22〕《四明尊尧集》在南宋、元、明、清四朝曾多次重刊,宋岳珂、程泌、刘震孙,元林兴祖,明张泰、舒芬、苏之琨,清李开叶都曾为其作序跋,极为推崇。

《宋史》卷二〇八《艺文七》著录“陈瓘《四明尊尧集》5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5著录“《四明尊尧集》1卷”。而《四明尊尧集》现有4卷本和11卷本,北京图书馆藏有4卷的明刻本,北京文物局藏有4卷的清影印元抄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清康熙十八年陈孔颖刻、雍正三年陈象瀚补修的11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据以影印,收入《四库存目丛书》,另北京图书馆藏有11卷的光绪十年刻本。其版本流传系统限于篇幅,在此不赘述。陈瓘历仕神、哲、徽三朝,又遭遇了当时几次较大的党禁,他的《四明尊尧集》更是直接与王安石《目录》对垒,所以应当是研究王安石变法和北宋后期党争的重要史料。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鲜有提及此书。另外《四明尊尧集》编录王安石《目录》65条,这可以为辑佚、补校王安石《目录》提供资料。本文不可能将《四明尊尧集》的全部价值都发掘出来,只希望能够做引玉之砖,以期引起学界的注意。

## 三、陈瓘入党籍及其姻亲和交游

陈瓘的敢言直谏,尤其是对王安石的直接批评以及对蔡京、蔡卞兄弟和章惇、曾布及绍圣诸政要的抨击,使他几乎在徽宗年间的每一次党禁中都受到了打击。崇宁元年(1102),陈瓘方46岁,即被责管勾冲佑观,以官观闲散之职来剥夺了他理政和言事的权利。五月乙亥(二十一日)籍元祐并元符末党人,陈瓘等五十余人并令三省籍记,不得与在京差遣〔13〕〔pp.5-6〕。随着五月蔡京出任尚

书右丞,党禁的风声一日严过一日。九月乙未(十三日),徽宗下诏,令中书省开具元符臣僚章疏姓名,把元符三年徽宗即位之初应诏上书的官僚士大夫按其上书的内容和性质分为七等:正上者六人,正中者十三人,正下者二十三人,邪上尤甚者三十九人,邪上者四十一人,邪中者一百五十人,邪下者三百一十二人。对于被定为正等的官员提拔重用,而对被定为邪等的五百多名官员视等级高下加以惩治,其中邪上尤甚者特勒停,永不叙收,余分送逐处羁管[14] [pp.3-11]。徽宗这种“引蛇出洞”的做法,是对“异论相搅”的祖宗家法的严重破坏。北宋灭亡,实与最高统治者视政治为儿戏,出尔反尔的举动有莫大关系。

九月己亥(十七日),徽宗又下御批:“应系元祐责籍并元符未叙受过当之人,各具原籍,定姓名、人数进入,仍常切契勘,不得与在京差遣。”[13] [p.8]文臣曾任执政官文彦博等、余官陈瓘等凡一百一十九人御书党籍,刻石端礼门。陈瓘除名勒停,编管袁州。崇宁二年,下令御史台抄录党人姓名,分送各地,外路州军皆刻石长吏厅。翌年六月甲辰(三日),诏:“重定元祐、元符及上书邪等事合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13] [p.16]而陈瓘预名其中。此时陈瓘已被远谪岭南海角之地——廉州了。

陈瓘的家族有一个十六字诀世代相传,那就是“事亲以孝,事君以忠,为吏以廉,立身以学”[15] (p.7)陈瓘以身行之,并把这种理念传给了后人。大观三年(1109年),陈瓘的长子正彙在杭州告蔡京有动摇东宫迹,而流放沙门岛。当时,陈瓘在明州亦被捕,酷吏李孝寿诱其承教正彙妄诉,陈瓘言:“平昔所以事君教子,岂于利害之际,有所贪畏,自违其言乎?蔡京奸邪,必为国祸,瓘固尝论于谏省,亦不待今日语言间也。”[15] [p.7]陈瓘的侄孙陈渊在高宗年间出任监察御史和右正言,也以敢言直谏而出名。

在中国古代专制社会中,往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另一方面则是一人得罪,株连九族。陈瓘以言入党籍,其亲朋好友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陈师锡与陈瓘齐年,两人在太学即定交,出仕后又同论蔡京、蔡卞之恶,时号“二陈”。后坐党论,监衡州酒;又削官置郴州[16] [p.10974]。陈瓘曾与龚夬、张庭坚、王涣之游,龚夬、张庭坚并入党籍,而王涣之在崇宁初年亦因此遭到连累[17] [p.11011]。邹浩、任伯雨、陈次升与陈瓘同气相投,在元符三年任台谏官时,多次同揭蔡京、曾布之奸,故同入党籍。陈瓘的妻兄周锸、姐夫李深皆入党籍,后人传为佳话。全谢山言:“盖大夫(即周锸)为范文正公外孙,自少即荷忠宣、右丞、待制三舅氏之教,而其初娶也,妇翁为胡右丞宗愈,其再娶也,妇翁为王学士觐。胡氏之寮婿,则邓考功忠臣。及端礼门立碑,范氏则忠宣兄弟三人及忠宣子正平,实为党丛,若胡若王,皆其耳目,而大夫与考功并预焉,忠肃则以《尊尧》之作为党魁,而其妹婿西山先生李深亦预焉。古今来之亲表固多气类相近者,然求其珠连璧合若此不可得,盖元祐党人中一佳话也。”①[18] [pp.7-8]虽然后世视为佳话,但在当时,给当事人及其子孙带来的却是灾难,他们在人身自由、科举考试和婚姻方面都受到了限制。不仅是元祐党人,包括他们的子弟都严禁进入京师;元符末上书进士,令州郡遣入新学,依太学自讼斋法,候及一年,能革心自新者许将来应举,其不变者当屏之远方。”这是让党人从思想上认识错误根源的办法。另外还规定“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人子孙及有服亲为婚姻,内已定未过礼者并改正”[13] [p.16]。宋代随着门阀士族的衰落,婚姻已是“不问阀阅”,至此则强行以政治分歧为鸿沟,把元祐党人及其子弟打入另册,在他们的婚姻上设置藩篱,进一步实施打击。

在这次党禁中,陈瓘由于攻击蔡京最烈,故被祸最惨。崇宁四年(1105)九月,诏元祐党人贬谪

① 陈垣先生《史源学杂文》之《书 鲒埼亭集·陈忠肃公祠堂碑 后》篇已指出:李深为陈瓘姊婿而非妹婿,西山先生乃李深之子郁。另外,据邹浩《道乡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七《高平县太君范氏墓志铭》第13—15页言:“夫人范氏,太子中舍仲温之女,资政殿学士、谥文正公冲淹之侄女也,嫁四明周公师厚。男三人:长锸,次铢,次慧印。”故周锸的外祖父并非范文正公冲淹,而是冲淹的仲兄仲温。谢山此处寥寥百余字,在人物关系上错了三处。

者以次徙近地<sup>[19]</sup> (p.375),陈瓘得以从廉州徙往郴州。此后元祐党人逐渐复官,但陈瓘仍然是流寓四方,无有宁日。

#### 四、从陈瓘之经历看北宋哲徽之际的党争

由于陈瓘在哲徽两朝屡次直接冒犯皇帝、后宫和宰相,所以他的仕途也跟着多次反复,不断地被召、外放、又被召、又被贬,直到后来流寓各地,卒穷以死。陈瓘的生平以及他在哲徽两朝的经历,在元祐党人中颇具典型性,可以藉此来考察哲徽之际的党争。

哲宗绍圣年间以及徽宗年间柄政的几位“新党”大臣,起初对陈瓘都抱有好感,并有荐举之恩。如元祐五年(1090)蔡京推荐陈瓘为太学博士。又陈瓘为越州通判时,当时的知州蔡卞对他“每事加礼”,后推荐他通判职田之入甚厚的明州<sup>[3]</sup> (p.10961)。绍圣元年(1094),章惇为相,也荐举陈瓘为太学博士。建中靖国年(1101),陈瓘除著作佐郎、实录院检讨官,后迁右司员外郎兼权给事中,有史料记载,这是曾布推荐的结果<sup>[9]</sup> (p.5)。应当说,这与当时经历过元祐政治打击的新党人士有欲息党争、调和两党之意有关。而陈瓘对这四人却言不苟容,采取了一种不合作进而攻击的态度,并视王安石为四人的“宗主”,对王氏更是大加挞伐。这种言行,使得新党当权者不能不怀疑“调和”之误,转而采取打击手段。

通过陈瓘这个个案,我们或许可以对北宋末年的一些政治事件重新认识。如章惇,史书说他:“专以绍述为国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复之”,又“报复仇怨,小大之臣,无一得免,死者祸及其孥”<sup>[20]</sup> (p.13711)。“故老、元辅、侍从、台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谓贤者,一日之间,布满岭海,自有宋以来,未之闻也。”<sup>[21]</sup> (p.10983)诚然,元祐诸臣在绍圣年间遭到了迫害,但渊源有自,他们自身难辞其咎。元祐时期,旧党人士一方面革除新法,恢复旧法;另一方面则罗织“车盖亭诗案”,将蔡确贬为英州别驾,新州安置,此外更开列出所谓王安石亲党30人,蔡确亲党47人,悉加贬黜。可见,罗织党籍,把持不同政见者贬往岭南,实是元祐党人开的先河。当时范纯仁即对此深表忧虑,他说:“此路荆棘近七十年矣,奈何开之,吾侪正恐亦不免耳!”<sup>[22]</sup> (p.4028)历史的发展不幸被他言中,数年之后,元祐党人即在绍圣年间被大量贬徙到岭南。章惇等新党人士重新上台,执政初期,也并非专务报复,也曾想调和两党,这从他引荐陈瓘这样梗直且思想倾向于元祐政治的人可以看出来。史书却不这么认为,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说章惇“以士心不附,诡情饰过,荐引名士如彭如砺、陈瓘、张庭坚等”<sup>[23]</sup> (p.13716)。而陈瓘在当时以舟设喻天下,认为欲平舟势,移左置右,则有矫枉过正之忧,力劝章惇“为今之计,唯消朋党,持中道,庶可以救弊”<sup>[3]</sup> (p.10961)。从中可见,陈瓘也认为熙丰、元祐时期之所以造成纷争,就在于朋党作祟,所以他认为应当不偏不倚,持中调和。然而,章惇等人荐引的这些“名士”,任职后却千方百计地攻击新党人士,企图恢复旧党统治,遂与新党执政者成水火之势。陈瓘虽有“消朋党”之说,但是由于他在学术渊源上曾师从杨时,再加上他潜意识的政治倾向是亲元祐、斥熙丰,所以他渐渐地走向了元祐党人的立场,最终陷入党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而在这样的情况下,章惇等新党人士,为调和所做的努力无效,并且面临旧党人士的猛烈攻击,再加上他们自己在元祐年间有遭受迫害的惨痛经历,于是索性放弃调和,加大了对元祐党人的打击力度。

绍圣四年(1097),陈瓘就对绍述新政的做法表示了质疑,他责备章惇说:“主上笃于继述,然今日庙堂,述神考乎?述荆公乎?”<sup>[24]</sup> (p.10)把王安石放在神宗对立面的位置。元符三年(1100),陈瓘出任言官,即上疏指出求言之诏未及旧弼,认为“耆德故老,久去朝廷,或在谪籍,或已得谢”,要求“圣问俯及,隆谦示敬”;“明示养老乞言之礼”<sup>[25]</sup> (p.184)。其实,所谓的“旧弼”,就是元祐旧臣。他还要求召回邹浩,贬逐章惇<sup>[6]</sup> (p.1310)随后又上书要求留龚夬<sup>[26]</sup> (p.612)。这样,陈瓘就把自己放在了元祐臣僚代言人的位置上。陈瓘的这些言行,是新党当权者所不能接受,也不能容忍的。

陈瓘的转变,集中反映在他对王安石的态度上。他曾经说过:“臣在谏省,请改《裕陵实录》;及在都司,进《日录辩》,当是之时,臣于《日录》未见全帙,知其为私史而已,未知其为增史也。待尽合浦,又著垂绝之文,考诋诬讪玩之言,见蔡卞偏增之意。尚谓安石趣录,皆可凭据,卞之所增,乃有诬伪。当是之时,臣于《日录》考之未熟,知其为增史而已,未知其为悖史也。”〔10〕p.3 陈瓘的这段自述,很好地揭示了他撰写《四明尊尧集》的思想动因和心路历程。他首上《日录辩》,继撰《合浦尊尧集》,又撰《四明尊尧集》,一次比一次加大攻击力度。其原因在于他骨子里倾向于元祐政治,对王安石逐渐失去了理性认识,相反认为王安石是绍圣、崇宁政治诸“恶”之源。绍圣是绍述新法,崇宁是尊崇熙宁,曾布据王安石《日录》修《神宗实录》,二蔡又是王安石的姻亲,是王氏政治路线的当然奉行着。因此,他不遗余力地对王安石加以攻击和清算。陈振孙言:“瓘在谏省,未以安石为非。合浦所著《尊尧集》犹回隐不直,未几,乃悔之,复为此书。以谓蔡卞专用《日录》以修《神宗实录》,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压宗庙。”〔27〕p.166 而全谢山亦言:“忠肃著《尊尧集》于合浦,以辟新学,尚不嫌意,迨著之四明,始以为无憾。”〔18〕p.7 这都反映了陈瓘对王安石和熙丰变法派态度与认识的转变。

陈瓘在《四明尊尧集 自序》中认为,熙宁年间有二吕——吕诲和吕惠卿所言切中王安石的肺腑之隐。吕诲说王氏“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视朴野,中藏巧诈;骄蹇傲上,阴贼害物”,而吕惠卿说王氏“尽弃素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至潜愬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狼)〔狠〕,方命矫令,罔上要君”〔10〕p.9。这两段话都是“妖魔化”王安石的,清人蔡上翔在其《王荆公年谱考略》中辩驳甚详,此不多言。但陈瓘却奉为知音,并把这些强行扣在王安石头上的帽子作为其驳斥王安石并最终指归,这就带上了先入之见。其实,王安石的私人品德和政治操守绝对称得上是“君子”。连极力诋毁王安石的邵伯温也不得不承认:“荆公、温公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28〕(p.122) 魏泰也记载:“王荆公再罢政,以使相判金陵……平日乘一驴,从数僮游诸山寺。欲入城,则乘小舫,泛潮沟以行。盖未尝乘马与肩舆也。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仅避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29〕p.139 从中可以看到,王安石没有半点退休宰相的排场和威仪。因此,王安石在去世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得到了士大夫的尊敬,据《清波杂志》记载:“当时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入荆公坟者。五十年前彼之士子,节序亦有往致奠者。时之风俗如此。”〔30〕p.514 陈瓘在《四明尊尧集》中处处质疑王安石的人品操守,难免带着意气,曲解甚至是诋毁。

下面略举几条,以知其概:

余曰:“汉宣帝不足法,陛下圣质高远,当慕尧舜三代盛王,如汉宣帝不足以言。”上曰:“朕自视未有一毫可比汉宣帝。朕意趣诚广大,但才力庸短,未能运动天下事,所以每事畏慎,不敢妄发。”〔引《日录》语〕臣瓘论曰:“《日录》所造神考谦辞,或曰‘朕鄙玩’,或曰‘朕才力庸短’,或曰‘朕自视未有一毫可比汉宣帝’,如此之类,不可胜举。矫诬圣训,欺罔士类,以启悖慢之习,可胜痛哉!”〔31〕p.5

陈瓘先引录了《日录》所记神宗与王安石的一段对话,然后又加以评论,主要是针对《日录》记载的神宗谦辞而发。陈瓘在心目中认为神宗是圣人,所以不能容忍这样的谦辞。其实神宗对“师友之臣”王安石非常尊敬,这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即可以得到佐证。所以他说出这样的谦辞也未尝不可。王安石忠实地把它记下来,也是为了彰显神宗谦逊的美德。而在陈瓘那里,这却成了王安石的一大罪状。

余曰:“且以近事验之,方边事之兴,陛下下一日至数十批降指挥,城寨粮草多少,使臣将校能否,群臣所不能知,陛下无所不察,边事更大坏,不如未经营时,此乃于陛下于一切小事劳心,于一切大事独误。今日国事,亦犹前日边事也。”〔引《日录》语〕臣瓘论曰:“真是安石之罪,归过宗庙。”〔32〕p.2 p.5

王安石认为神宗纠缠于细务,反误了大事。对于宋代皇帝猜忌武将,前线军事事事插手,甚至授

作战图的做法,学界已多有论述,无需笔者饶舌。王安石看到了其中的弊端,要求神宗在小到军事,大到国事方面不必事事躬亲,做到抓大放小,可谓切中肯綮。但在陈瓘那里,却成了“委过于君”。

而对于《日录》的写作意图,陈瓘认为是“神考熙宁之末,既逐邓綰,寻出安石,尤以神考陟降为非,而诬造圣训者于文字,以舒其悖讪之气”〔33〕〔p.3〕。至于神宗称王安石为“师友”,则被陈瓘看作是王安石“傲然自圣”〔34〕〔p.2〕。这样的例子不一而足,限于篇幅,不再列举。

正因为《四明尊尧集》不遗余力地攻讦王安石,归罪王安石,全面否定王安石及其政事,所以《四明尊尧集》被视为批判新学和新党的一面理论旗帜,而陈瓘亦因《四明尊尧集》之作而被目为旧党的一个急先锋和旗手。所以在元祐党人中,他虽名居余官之列,但受到的打击比曾任宰执、备位侍从的党人还要大。到了南宋,随着新学地位的逐渐下降和元祐学术的坐大,理学成为官方哲学,陈瓘及其《四明尊尧集》才日显隆宠。到明人撰《水浒传》(120回本)时,陈瓘居然被请出来,和宋江一同去征田虎,可见陈瓘在士大夫之间乃至民间的影响极大。

陈瓘在哲、徽时期的经历雄辩地说明,当时两党之争发展到意气用事、人身迫害,新党人士如章惇等人固然要负重要责任,但“一个巴掌拍不响”,旧党人士尤其是尚被任用的旧党人士如陈瓘等人,也要负不可推卸的责任。如《四明尊尧集》之类的人身攻击,与《辨奸论》等文形成了一股非常可怕的人身攻击的舆论浪潮,矛头直指在士大夫中享有盛誉的新党领袖王安石,更使新、旧两党的矛盾由政见的不同迅速向人身攻击转化,党同伐异,是非曲直早已被置之脑后。其结果不仅旧党人士遭到打击,新党人士亦未能幸免,可说是两党均归于失败。伪新党如蔡京之流则乘机扶摇直上,左右朝政,径直将北宋统治导向灭亡。北宋历史在12世纪初叶前后,就是这样上演了一幕耐人寻味的悲剧。

### [参 考 文 献]

- [1] 曾巩. 曾巩集·秘书少监赠吏部尚书陈公神道碑铭·卷四七〔M〕.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4.
- [2] 陈瓘. 先君行述〔A〕. 永乐大典·卷三一四一〔M〕.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6.
- [3] 阿鲁图. 铁机塔识·宋史·陈瓘传·卷三四五〔M〕.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5.
- [4] 朱熹. 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三〔M〕. 清同治戊辰临川桂氏重修本, 1868.
- [5] 陈瓘. 乞以四次改更前事为鉴〔A〕. 赵汝愚. 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一九〔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1999.
- [6] 陈瓘. 论绍述〔A〕. 赵汝愚. 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一九〔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1999.
- [7] 陈振孙. 陈忠肃公祠堂记〔A〕. 林麦民. 赤城集·卷八〔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8] 刘震孙. 刘朔斋跋尊尧集〔A〕. 陈瓘. 宋忠肃陈了斋四明尊尧集·卷一一〔M〕. 济南: 齐鲁书社·四库存目丛书本, 1996.
- [9] 杨仲良. 长编纪事本末·陈瓘贬逐·卷一二九〔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宛委别藏本.
- [10] 陈了翁. 四明尊尧集序〔A〕. 陈瓘. 四明尊尧集·卷一〔M〕. 济南: 齐鲁书社·四库存目丛书本.
- [11] 徐松. 宋会要辑稿·礼五十八之七〔M〕.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57.
- [12] 永乐大典·瓘谥忠肃制·卷三一四三〔M〕.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6.
- [13] 长编纪事本末·禁元祐党人上·卷一二一〔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宛委别藏本, 1988.
- [14] 长编纪事本末·编类元符章疏·卷一二三〔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宛委别藏本, 1988.
- [15] 林兴祖. 陈了翁年谱序〔A〕. 永乐大典·卷三一四三〔M〕.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6.
- [16] 阿鲁图. 铁机塔识·宋史·陈师锡传·卷三四六〔M〕.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5.
- [17] 阿鲁图. 铁机塔识·宋史·王涣之传·卷三四七〔M〕.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5.
- [18] 全祖望. 鮑埼亭集·陈忠肃公祠堂碑铭·卷二三〔M〕. 四部丛刊初编本.
- [19] 阿鲁图. 铁机塔识·宋史·徽宗二·卷二〇〔M〕.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5.
- [20] 阿鲁图. 铁机塔识·宋史·章惇传·卷四七一〔M〕.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5.

- [ 21 ] 阿鲁图. 铁机塔识. 宋史·龚夬传. 卷三四六[ M ].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5.
- [ 22 ]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四二七[ 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 23 ] 阿鲁图. 铁机塔识. 宋史·曾布传. 卷四七一[ M ].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5.
- [ 24 ] 永乐大典·陈了翁年谱. 卷三一四三[ M ].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6.
- [ 25 ] 陈瓘. 论求言之诏未及旧弼[ A ]. 赵汝愚. 宋朝诸臣奏议. 卷一九[ 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1999.
- [ 26 ] 陈瓘. 乞留龚夬[ A ]. 赵汝愚. 宋朝诸臣奏议. 卷五五[ 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1999.
- [ 27 ]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 卷五[ 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1987.
- [ 28 ] 邵伯温. 邵氏闻见录. 卷一[ M ].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3.
- [ 29 ] 魏泰. 东轩笔录. 卷一二[ M ].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3.
- [ 30 ] 周辉. 清波杂志·王荆公墓. 卷三[ M ].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94.
- [ 31 ] 陈瓘. 四明尊尧集·论道门第二. 卷三[ M ]. 济南: 齐鲁书社四库存目丛书本, 1996.
- [ 32 ] 陈瓘. 四明尊尧集·边机门第五. 卷六[ M ]. 济南: 齐鲁书社四库存目丛书本, 1996.
- [ 33 ] 陈瓘. 四明尊尧集·处己门第七. 卷八[ M ]. 济南: 齐鲁书社四库存目丛书本, 1996.
- [ 34 ] 陈瓘. 四明尊尧集·寓言门第八. 卷九[ M ]. 济南: 齐鲁书社四库存目丛书本, 1996.

## On Chen Guan and His Si Ming Zun Yao Ji

——With a Look at Factional Strife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s  
Zhezong and Huizong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ZHANG Qi-fan, JIN Qi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Ancient Books, Jinan University, Guangdong 510632, China*)

**Abstract:** Chen Guan, whose grandfather had laid a firm ground for the family's official career, was born in Nanjianzhou Prefecture (present Shaxian, Fujian) under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 terms of his academic origin, Chen Guan studied under Yang Shi, belonging to the Yuanyou school of learning.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Huizong, he was twice a court official and spared no effort to censuring the ministers in favor of political reformers, including Zhang Dun, Zeng Bu, Cai Bian, and Cai Jing. He strongly opposed the rule of Shaosheng, while advocating the restoration of the original political state of Yuanyou reign, thus becoming one of the targets of attack from the reformers for being a member of the "Yuanyou clique". Having been banished to many places, Chen Guan lived an unstable life, with many of his relatives and friends involved in trouble. During his exile, he wrote Zun Yao Ji (Collections in Respect for Emperor Yao) twice to reprove Wang Anshi's *Ri Lu* (Daily Records), with an intention to expose and criticize the reformers theoretically. Therefore, he became a standard-bearer attacking the new school of learning and the reformers, which brought him more political persecutions.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Huizong, instead of settling the up-going factional strife, most of Chen's deeds, such as his blaming Zeng Bu for his "adjustment" in the Jianzhong Period, and his personal attack on Wang Anshi in his book *Si Ming Zun Yao Ji*, made the political conditions even worse. The factional strife that went on in the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urned from the difference in political viewpoints to emotional disputes and finally to personal attacks. Clinging to narrow factionalism, the old and new parties tried their utmost to do down each other and attack each other. It was true that the new party should be partially responsible for such a political situation, but Chen Guan and the old party were by no means free from accountability. Under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ith the gradual decline of the new learning



and the rising of the Yuanyou academic learning, Chen Guan and his Si Ming Zun Yao Ji gained popularity. From then on, Chen Guan's moral ideology,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works began to be well received, eve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en Guan; Si Ming Zun Yao Ji; factional strife; members of the Yuanyou clique

## 学生中心教育理念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一个实现条件

“学生中心教育理论”主张学校为学生而设,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健全的人格,促进人的自我实现(《教育心理学——三化取向的理论与实践》张春兴著)。但人格的塑造不是自发形成的,也不是在一般的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过程中完成的,只有人格才能影响到人格的发展。虽然从理论上讲大学生的个体人格特征已基本形成,但实际上,大学生尤其是那些正处在接受基础教育阶段的大学新生,由于学习环境的变迁、学习条件和方法的改变、生活习惯的变化以及社会现实与他们的“理想自我”之间存在的差距等因素,被发现在自我发展、人际交往、环境适应等方面都存在着能力欠缺的问题。因此,从事语言教学的人文学科教师所承担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对大学生的道德情操教育和健全人格的培养。教师应认识到人格力量的升华作用,甚至可能是伟大文化和艺术成就的源泉(弗洛伊德语,“Psychology”David G. Myers著)。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提倡“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不应该局限于在教学环节中加入或突出主要由学生参与的课堂活动的教学模式,其意义应体现在以人(学生)为本的人文内涵上。

教育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提出了“教学模式的改变不仅仅是教学活动或教学手段的转变,而是教学理念的转变,是实现从以教师为中心、单纯传授语言知识和技能的的教学模式,向以学生为中心、既传授一般的语言知识与技能,更加注重培养语言运用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教学模式的转变”,要求大学英语教师认识“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的主旨是以人为本,最大程度地满足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修学公共英语课程的大学生对英语习得的需求,在情感上真正认同和接受教学“以学生为中心”的倡议,采取积极的态度、运用适当的方法在教学进程中贯彻体现这种精神,调整并磨合好教与学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实现从传统的以教师为导演兼演员的“单向”教学模式,向以教师为导演、学生为主要演员的新型“互动”模式的转换。然而,这一转换能否成功,在教师一方是有条件的。

在外语的教学环境中,公共英语课程要使学生产生兴趣并保持热度,教师的教学态度和教学方法起着关键的作用,而教学态度又影响着其教学方法。《当代社会心理学》(金盛华、张杰著)“认知心理学”一章中指出:态度是认知、情感和意动成分的复合体,它影响人们理解、感受事物和对事物作出反应的方式。自我价值定向理论提出:行为与态度的选择决定于行为和态度对于个人的价值。也就是说,一种具体的行为究竟是否发生,取决于这一行为的后果对于行为者的价值。影响教师教态的因素很多,且每个个体各有不同,但是有一共有因素,那就是评价是否公平。詹尼夫·M·乔治在《行为组织学》中提出“公平理论”的观点:当一个人察觉到自己的工作与所得到的报酬之比同其他人的工作与报酬之比相等时,就公平,否则就不公平。公平的实质是平等,它体现在对人格及其权利的尊重上。教师在付出时间和心血适应教改、实践教改的同时,他们希望自己的付出得到正确的评价;当他们受到学生和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和检查时,他们期待其结果的意义有所体现;同时,他们认为自己对在同一个单位(学校)工作的与教学息息相关的其他部门,包括行政、教务和后勤等部门的工作也应拥有监督和评价的权利。在我国教育界,对此问题一般的提法是:教师处于教育、教学第一线,机关(即行政、教务、后勤)是为第一线服务的部门。但在实际运作中情况却并非如此。机关的指导和监督的职能被大大扩大,且延伸至几乎每一位干部,而服务意识则相应淡化,表现为职务行为的机械、低效与冷漠。在笔者对北京、华东、东北和西南的四所高校大学英语教师所作的问卷调查中,92%的有效答卷反映了这一角色倒置,并表示治学理念的这一缺失将直接影响作为学校生命线的教学关系及其成效。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的实施不只是、也不应该只是大学英语教师的使命。

人文学科关系到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和人文导向,关系到一个民族形象和精神的塑造(张中载《外语教学与研究》)。大学英语这一门面向广大修学公共英语课程的大学生的人文学科课程,要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必须得到学校的人文治学理念的支持。

(陆建平)